

近代昆明中药业的师徒传习制度

杨祝庆

【摘要】 清朝末期昆明药材行帮出现后,作为行规的“投师文约”也开始出现,标志着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的契约化和制度化。“投师文约”的实施,由药材行帮及其同业公会组织。昆明中药业的师徒传习具有扩大了人才来源、契合药工熟识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符合中药制造人力操作的条件、符合中药技艺口传心授的特点和规律、医药一体、非政府组织等特点。昆明中药业的师徒传习,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人才,推动了手工作坊向工业化的转变,催化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从药材与成药兼营中的分离,形成的有效的师承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师约; 师徒传习; 中药业; 昆明

The apprentice edu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al industry in modern Kunming YANG Zhu-qing. Department of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on, Kunming Chinese Medicine Factory Co., Ltd., Kunming, 65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of Kunming, the “master agreement” as a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also implemented,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ractu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pprentice education in Yunnan. The conten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ter agreement” was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of Kunming and its craft union. The apprentice education in Kunm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industr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expanding the source of talent; adapting 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accorded apprentice; conform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manipu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being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Chinese medicine skills taught by oral narration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unity of th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pprentice training had trained a number of medical talents,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al workshop to industrialization in Kunming. Apprentice education had cataly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shops selling patent medicines exclusively to separated from those running both crude drugs and patent medicines, to form a set of effective teaching system, thus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Indenture; Apprentice education; Chinese professional pharmaceutical; Kunming

投师文约是师徒传习的公开凭据。近代昆明药行的投师文约开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顿于1938年。这30余年,正值昆明手工制药业繁盛之时。师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昆明中药手工作坊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中药专业人才,保护和传承了中医药传统技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师徒教育措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目前,对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传承制度,尚无专门研究。笔者搜集并查阅了这方面的档案史料,选取档案史料较完整的1906—1938年这一时段,考察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传习状况,探讨其产生、发展和实施情况,揭示其优

势和影响。

1. 投师文约产生的背景

投师文约是师傅和徒弟双方约定的文书,又称“师约”“师约束”“投师文卷”“师徒契约”。昆明药行的投师文约出现于清末。如昆明药铺“大安堂”店主杨兴周,12岁时(1875)投到“春生堂”(今正义路庆云街口)欧庆余门下当学徒,订5年投师文约^[1]。清末所谓“药行”或“药材业”既指药材供销业,也包含丸散膏丹等成药的产销业,一度也曾含民间草医。清光绪前期及其之前,昆明药行的投师文约估计处于自发、零星时期,尚未作为行规。

作为行规的投师文约是在行帮之后出现的。行

帮是商人组成的行会组织。清光绪元年(1875),云南杜文秀起义后,昆明社会安定,市场逐渐兴盛。药材商人在昆明设立号口,或专做趸庄批发生意,依业务或籍贯,结成行帮^{[2]27}。在昆明的行帮,外省的有川帮、广帮、浙帮、京帮、赣帮等;本地的有昆明帮、迤西帮、鹤庆帮等,尤以川帮、西(西康)帮、滇帮和粤帮的势力较大。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同业竞争,行帮订立规约,对学徒、开设地段等加以限制。具有师徒合同性质的投师文约——师约束,由行帮合议,规定了药铺、学徒和举荐人的责任(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12-60.)。这是昆明师约的萌芽期。

较成熟的投师文约是随行帮组织——商会的成立而出现的。清朝末年,法国加紧在云南的掠夺。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被迫辟为通商口岸,随后,思茅关、腾越关相继开通,外国药品和仿制药品充斥云南市场。蒙自、昆明、开远等地已成为云南中西药品争夺的主战场。为保护商业,繁盛商埠,光绪三十年(1904)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谕令各省设立商会。同年,经云南农工商务局准许,行帮的团体组织——云南省垣商务总会在昆明成立。总会之下设分会,有昆明商务分会、云南迤西下关商务分会、东川商务分会等。由于各帮纷争,昆明商务分会未能如期成立,昆明行帮的日常业务直接受云南省垣商务总会管理^{[2]12}。

有了行业组织机构,昆明各行帮修订了行规。行规里有投师文约。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滇西下关商务分会章程有了“投师文卷”的规约。凡行号商铺所用管事、学徒人等,均应谨守号规:“招用学徒必须当凭保人,书立投师文卷。倘不遵本号规约及有偷窃、违误、潜逃等事,除将学徒科以应得之罪,均惟保人是问”。师徒教育、推荐用人等振兴之法,在近代云南商会中受到热烈欢迎,会董把它作为“与列强竞争,振兴商务”的有力举措,称赞说“意美法良,莫善于此”,希望借此“力除积弊,以维自有之权利”(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9-1-172.)。

昆明中药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是投师文约实施的内在动力。当过学徒、任过师傅、且经办过投师文约的“管事”李述尧认识到:“国药业是技术性的行业,要有专长经验,方能保障对人民健康服务”。他深感中药铺“业务多而缺乏人,虽能马上开办,但对招收培养新的后备力量,短期内是不能学习得到的”。因此“希望本行业的从业人员,政府照顾,使其归口入行,……使其发挥专长”(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7-2-607.)。李述尧带头“传习工艺,振兴实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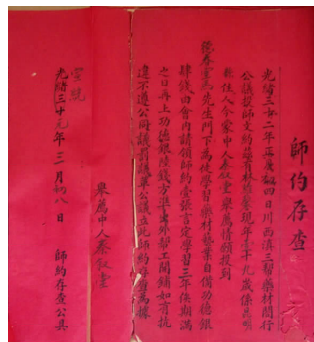


图1 昆明市档案馆藏《师约存查》宣统元年柬(1909)

在振兴商务的呼声中,投师文约在昆明中药业以书面形式订立。作为行规,昆明药行明文规定投师文约推行的时间,见于云南省垣商务总会成立之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昆明市档案馆晚清档案《师约存查》记载:“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川西滇三帮药材合行公议投师文约”(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 (图1)。书面师约束的出现,是昆明师徒教育契约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师徒教育进入新的时期。

2. 师徒传习制度的实施

2.1 组织机构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是由药材行帮及其同业公会组织的。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昆明药材业投师学艺的组织者为药材行帮。药材行帮先后称:“川西滇三帮”和“川西滇粤四帮”。2帮从清末至民国中期,承担了“师约公具”的办理。

“川西滇三帮”指清末以四川帮、西康帮和云南帮为主的在昆行帮,就是说,“川西滇三帮”之名是在昆行帮以籍贯为号的称谓。以“德生药材行”为首的川帮、以“同传合”为主的西(原西康省)帮和“寅生堂”“利济堂”等滇帮,是清末昆明药材行帮的主干。川西滇三帮每年在昆明三皇宫(今鱼课司街)会馆集会,举行全药材业参加的“药王会”,交流行情,公议行规,办理“师约公具”。行帮既是药商的结合体,又是云南总商会的成员。如1917年6月,改组成立的云南总商会吸收了各行业的67名代表参加,其中药材业有2名会董,分别是在昆明文庙街开设“谦益祥”的四川省巴县籍人王世翊(别号汝翹)和在昆明文庙街开设“德生行”的江西省清江县人傅之骥(别号玉卿)(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12-18.)。

清末,川西滇三帮承担了昆明药材业师约的订立。据《师约存查》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至宣统三年(1911),川西滇三帮组织师徒传艺,办理了27

名学徒的投师文约。其中,19 名为昆明籍学徒,占七成。其余有呈贡、邓川、永昌等郊县和专州县的学徒。拜师学艺的药号有“恒春堂”“德春堂”“寅生堂”“利济堂”“六和堂”“庆余堂”“德生行”等 10 多户(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寅生堂”的徐显堂、“德生药材行”的傅玉卿等先生分别收吴树臣、张仁忠等学徒,传授药材艺业(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7-3. 31-24.)。辛亥革命后,昆明药材业的商人沿袭清朝的行帮组织。由于“南利生”(明利生)的覃氏(1917)、“怡泰祥”(1920)的黎伯海等广东帮先后在昆明设店,药材行帮自 1924 年起在川西滇三帮基础上增加粤帮,称“川西滇粤四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川西滇粤四帮设“管事”2 名,负责行帮日常事务,办理师约手续。

到民国中期,在行帮基础上改组为药材业同业公会。与其他行业相比,药材业改组较早。据档案记载,1931 年 3 月,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发起人赵樵等 14 人申请许可,拟定章程,召集成立大会,选定职员,并将组织章程呈请市商会等部门备案。申推“百寿堂”的赵樵为主席,“协盛昌”的李丞祖、“福林堂”的李保年、“百福堂”的赵福和“益兴和”的陈联科 4 人为常务委员,“同记合”的陈汝骥、“大成堂”的毛廷杰、“玉六堂”的翟廷辉和“同传合”的熊兆凤 4 人为执行委员,“鸿记”的张仁忠和“宏寿堂”的刘源为监察委员(图 2)。1931 年,参加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的有 92 家商号(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7-3 ~ 31-21.)。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会址设在四牌坊的“百寿堂”内。同业公会职员负责投师文约的办理。填写投师文约的经办人仍称“管事”,“管事”3 年 1 届,轮流执掌。自 1924 年起,先后担任“管事”的有刘仙槎和赵衡三(1924—1926)、马致和和周吉安(1927—1929)、赵衡三和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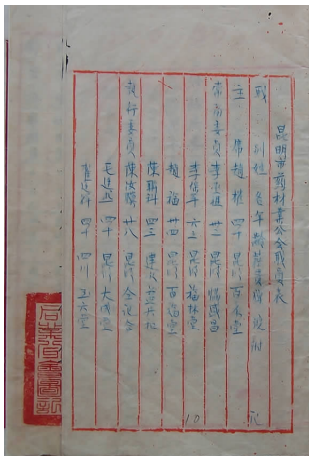


图 2 昆明市档案馆藏药材业同业公会职员表(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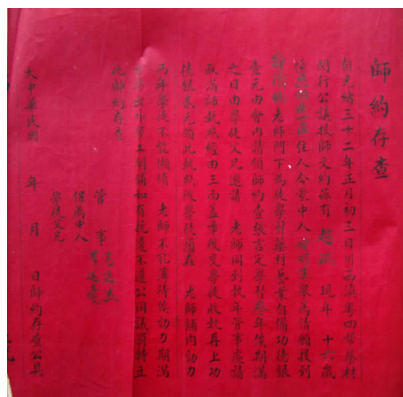


图 3 昆明市档案馆藏赵斌(赵子信)师约(1934)

维三(1930—1932)、刘仙槎和杨畴五(1933—1935)、毛少林和李述尧(1936—1938)5 批。同业公会负责师徒契约的办理,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因日军轰炸昆明城,药铺疏散而停止)。

“管事”为兼职职员,他们是中药铺的店主。如赵衡三经营“百龄堂”(百寿堂)、顾维三经营“仁安堂”、杨畴五经营“杨大安堂福寿药号”、毛少林经营“大成堂”、李述尧经营“协盛昌药号”等,这些药铺实力较强,都曾招收学徒,扩大经营业务。

2.2 师约内容和实施

据《师约存查》档案,近代昆明药材业投师文约的主要内容有 5 项:①开始实行时间:“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川西滇三帮药材合行公议投师文约”,即从 1906 年起收徒学艺须订立文约。②学习的内容:“药材艺业”。③招收程序:中人举荐作保,父兄见证,行帮或同业公会具办,并举行药工拜师仪式,正式收徒传艺。④学徒的责任:“自备功德银肆钱,由会内请领师约一张,言定学习三年,俟期满之日,再上功德银六钱,方准外出帮工开铺。如有抗违不遵,公同议罚。”⑤学徒义务:1924 年起,除功德银钱增加外,在原约基础上又规定了满师效力期,即“领此执照后学徒须在老师铺内效力两年,学徒不能懒惰,老师不能薄待,俟效力期满后方准出外帮工开铺”(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 (图 3)。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实施了 2 个时期:晚清和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大剧变,但师徒教育在昆明中药业由于组织严密,资金雄厚,办事认真,又有会馆作为基点,因而持续未断。

清末 6 年(1906—1911),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起步。据《师约存查》档案统计,自 1906 年起的 3 年内,未见投师文约。1909—1911 年,昆明中药业 27 名学徒订立师约,绝大多数订约 3 年的学艺期,如“恒春堂”刘继周、“六和堂”陈光祖、“致和堂”郭

庆春等。“大德堂”“德春堂”“寿安堂”“庆余堂”等药铺各先后收徒 2 名(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尽管前 3 年可能未订立师约,但后 3 年师徒教育已在主要中药铺里启动。清末 6 年(1906—1911)可谓是师徒传习的起步期。

辛亥革命后,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得以发展,初见成效。据《师约存查》档案统计,1911—1938 年,昆明中药业共 185 名学徒订立师约,并拜师学艺。这一时期以 1924 年为界分 2 个阶段:1924 年之前订立投师文约计 91 份,主要药铺均有签约。“成春堂”师傅聂成春与周有庆、“吉元堂”师傅苏氏与董祖培、“寅生堂”师傅徐氏与杨克谦、“大安堂”师傅杨氏与熊国明、“济生堂”师傅周氏与赵福、“福林堂”师傅李氏与李宝斌、“利济堂”师傅傅玉卿与陈灿南、“大成堂”师傅毛少林与李仲仙、“福元堂”师傅姚静仙与杨荣祥徒弟等分别订立师约(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25-739.)。1924 年后订约 94 份,大药铺的师傅集中招收学徒,有的同时招 2~3 人,如“益兴和”的陈氏、“百寿堂”赵衡三、“大安堂”杨畴五、“福林堂”李氏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药铺师傅。经过传授,部分学徒满师后取得药业执照,如李应辰、杨泽厚、金从英、李忠全、施炯等。部分学徒满期后晋升为店员,如李鸿昌、赵子信、杨润等。还有部分学徒毕业后开设药店,如赵萱(仁安堂)、李振芳(春和堂)、赵又仪(赵福)等,从学徒变成师傅。

2.3 教学内容和规模

近代昆明中药业的师徒教育,教学内容丰富。除医药典籍外,还包括药材知识、药店管理、推销术等应用知识和技能。以药铺学徒为例,所学内容主要有药材识别、炮制技艺、配方、中医诊断,甚至经营管理等医药知识。如清末在“春生堂”当学徒的杨兴周掌握中药行道的技术较全面,“对饮片的炒煨炮炙,……十四种制法;丸散膏丹的收膏制剂,各工序要领,认真揣摩领悟。闲暇时还偷空苦读《证类本草》《本草纲目》《金匱要略》等医药经典”^{[2]131}。1934 年投到“天福参药号”,跟随店主郑继卿当学徒。后来任昆明中药厂厂长的赵子信回忆说:学徒“什么都学,学药材,学药性,样样事都学;抓药,切药,主动学”,“我们那时掌握的技艺多,从药材、炮制、做药,到配药、检测都要懂,比较全面。不像现在分得很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 赵子信访问记录,2013.)。赵子信还学医学,后来竟能行医。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业绩显著,已有相当

规模。从昆明市商会档案看,昆明市商会第 2 届代表推荐的 1938 年前后,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工会所属商店 81 户,年均使用人数 324 人(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7-3~31-19.)。初步统计,有案记载的投师学徒 1906—1938 年昆明中药业共有 212 人(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 32-25-739, 32-25-749.)。除辍学、转行等流失者外,估计接受教育的学徒占药店使用人数的 2/3。自 1924 年起“学习年限满期”者获得满师执照(图 4)。如 1924—1928 年,获得满师执照的有武光、李荫臣、杨泽厚、赵鲁等 29 人(表 1)(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32-30-177.)。学徒和店员队伍,成为近代昆明药业主要的技术工。

3. 师徒传习的优势和特色

与家传相比,师徒传授突破了家庭的限制,与社会化生产相结合,在许多方面显示出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其一,师徒教育扩大了人才来源。父传子受是古代昆明医药教育的重要方式。昆明较早而名声颇大的医药世家有世袭军医管氏、朱氏和罗氏等医户,“万松草堂”的孙氏、“姚济药号”的姚氏等几家。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军来滇的管致和^[3]、朱双美^{[4]306}、董赐^[5]等军医,在明朝医户世袭制下,世代为医;到清末管暄、管俊、朱自新、罗开泰等辈已经历 10 多代,代代相传,制售杨林丸、小儿化风丹等中成药。在农业社会,医药市场竞争尚不剧烈的情况下,代代相传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世代接力,探索和积累了医药经验和知识,促进了医药事业发展。但是,当药市渐开,西药充斥之时,欲“与列强竞争,振兴商务”,那种父子相传,甚至传男不传女等家传习俗,就难以满足市场对中医药技术及人才的需要。而对外招收学徒的师徒制度,则扩大了人才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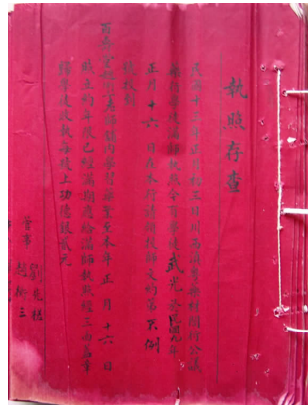


图 4 昆明市档案馆藏满师执照存查(1924)

表 1 1924—1938 年获得满师执照学徒表

学徒	药号	师傅	学年	管事	举荐中人	学徒父兄	领取满师执照时间
赵嘉义		法成云	3	毛廷述、李述尧		赵献之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1938)
赵鲁	大成堂	毛少林	3	毛廷述、李述尧	张华	赵仪周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1938)
刘发荣	大成堂	毛少林	3	毛廷述、李述尧	华兴甫	刘灿章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1938)
莫贵	德寿药房	夏鼎	3	毛廷述、李述尧	赵礼信	莫汝贵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1938)
李忠铨	益兴和	陈联科	5	刘源、杨福	萧庆斋	李显英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1934)
李本宽	益兴和	陈联科	5	刘源、杨福	郭静堂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1934)
李本恭	益兴和	陈联科	5	刘源、杨福	郭静堂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1934)
李鸿钧	立德堂	殷汉章	4	刘仙槎、杨畴五	杨选之	李文阶	民国二十三年正月(1934)
晏蒙俊	德寿堂	夏畴九	3	刘仙槎、杨畴五	丁九皋	晏家贵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1933)
施炯	陞大药庄	陈陞阶	4	刘仙槎、杨畴五	洪澄	施鸿恩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1933)
冯士扬	百寿堂	赵衡三	3	刘仙槎、杨畴五	窦润阶	母冯陈氏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1933)
李荣富	太和堂	郎蔚卿	5	赵衡三、顾维三	窦宽	李荣华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1932)
苏永斌	庆元堂	李元庆	5	赵衡三、顾维三	陈荣富	苏占友	民国十九年正月(1930)
王必仁	百寿堂	赵樵	3	赵衡三、顾维三	何仰之	王泽恩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1929)
李汝昌	保安堂	唐蔚森	3	赵衡三、顾维三	段桐岗	李钦臣	民国十八年正月(1929)
金从英	大安福记	杨畴五	3	周吉安	余海清	全维聪	民国十八年七月(1929)
杨泽厚	大安福记	杨畴五	3	周吉安	周廉臣	杨石庵	民国十八年七月(1929)
欧运贵	益兴和	陈联科	4	赵衡三、顾维三	欧源之	欧树武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1928)
包松林	益兴和	陈联科	4	赵衡三、顾维三	唐继瑞	包乾之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1928)
李荫臣	济生堂	周	3	周吉安、马致和	武士昌	李世清	民国十六年十月(1927)
赵连臣	百福堂	赵福	3	赵衡三、刘仙槎	武云	赵发	民国十五年九月(1926)
全福安	百福堂	赵福	3	赵衡三、刘仙槎	武云	全仕驂	民国十五年九月(1926)
段敏	同顺堂	王	5	赵衡三、刘仙槎	李俊臣	段培礼	民国十五年正月(1926)
杨发云	宏寿堂	刘源	4		苏选卿、孙长寿	李俊仙	民国十四年正月(1925)
李发	寅生堂	徐	4		苏选卿、孙长寿	李俊仙	民国十四年正月(1925)
杨发富	宏寿堂	刘源	3	刘仙槎、赵衡三	孙长寿	杨富	民国十三年正月(1924)
缪樑臣	百寿堂	赵衡三	3	刘仙槎、赵衡三	缪云峰	缪紫廷	民国十三年正月(1924)
邹重斋	百寿堂	赵衡三	3	刘仙槎、赵衡三	周吉安	邹豫泰	民国十三年正月(1924)
武光	百寿堂	赵衡三	3	刘仙槎、赵衡三	武云	武俊斌	民国十三年正月(1924)

其二,师徒教育契合药工熟识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近代昆明药铺的学徒大多来自昆明近郊或专县农村。他们有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有花草知识,有拣菜煮饭、推磨歛碓等实际经验。“药食同源”,许多中医药知识和经验正是农业和饮食的结晶。这些人当学徒有基础,上手快,情愿干,留得住。当时,制药工具多为碾槽、簸箕、敲杆、铡刀、盆、罐等家用工具。药铺店主和师傅不仅看中他们的老实本分,而且喜欢他们使用器具的驾轻就熟。不论是帮着做家务活计,还是拣择药材、炙药、配药,都能胜任。聪明伶俐记性好的,师傅愿意多教多说,掌握的知识技艺丰富娴熟,多能成为好帮手和好药工。

其三,师徒教育符合中药制造人力操作的条件。近代昆明药铺学徒文化程度低,许多甚至是文盲或盲人,但他们年轻体壮,劳力强。民国时期,昆明地区全药材业学徒多为初高小文化程度,识字不多,少数为文盲。据老药工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昆明全药材业盲人达 20 多人。招收这些人,师徒之间口口相传,便于徒弟接受和学习。如专碾药粉的盲人、做蜜丸的女工、站柜台的伙计,因材施教,各展所长。碾、

铡、切、搓等咀片生产,全是体力活,手工操作,又苦又累,劳动强度大,学徒体格强壮,能担当制药工作。

其四,师徒教育符合中药技艺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和规律。制药技艺尚未或不便完全传通过文字传授。尤其药材辨识、加工技巧、炮制火候等技能,口传心授的特点极为显著。因此,口口相传的师徒教育,心心相印的领悟和实践,是药艺传习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师徒教育,手把手地教授,眼观、鼻闻、口尝等感官知识和人工技术,符合中医药非文性的特点和规律。制药工艺,如炮、炒、煨、炙等各种优良的传统的制法,许多诀窍非文字所能企及。口授心传,便于徒弟领会其中奥妙。

其五,医药一体。这是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传授的特点之一。一方面,师傅医药兼营者较多。清末,昆明中药铺往往前店后坊,医药一家,如“万松草堂”“玉六堂”“姚济药室”“寅生堂”“福元堂”等,均以医兼药,医药不分。“医之起,起于药也”^[6]。近代云南四大中医世家谙熟药性,或自制成药,如姚荫轩的桑菊银翘散、戴显臣的妇科调经散、吴佩衡的附子汤和康敬斋的痞积散,大都因药而名。“福林



图7 李述尧(1956)

4.2 推动了手工作坊向工业化的转变

师徒教育促进了制药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发展。

首先,加剧了中医师与中药商、零售药商的分离。清朝中叶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1),行医与卖药逐渐分开^{[4]306}。但到清末,昆明药行中医药兼营仍是主流。药铺师傅既是中医师,又是中药商、零售商。如陈力畴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设的“天元堂”,姚静轩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的“姚福元堂”,姚勋琥宣统三年(1910)开设的“正支生华堂”等药铺,均以医兼药^{[4]308-311}。店主是中医师,又是中药商、零售药商。师徒制度的实施,加速了中医师与中药商、零售药商的分离。1944年2月,昆明市政府拟定《医药登记领照暂行规则》,将医药卫生人员分为11类,其中中医药有中医师、中药商和零售药商3类并列,专业职能明显分离。开业执照上注明3类职业的种类。以1945年为例,昆明市临时登记的开业人员已按中医师、中药商和零售药商3类不同的职业种类给证,该年新增的中医师、中药商和零售药商分别为27户、9户和26户(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32-9-16.)。一批中医师领取了中医师开业执照,如熊元滋、戴丽三、吕华斋等。医药卫生人员的专业职能继续分化。

其次,催化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从药材与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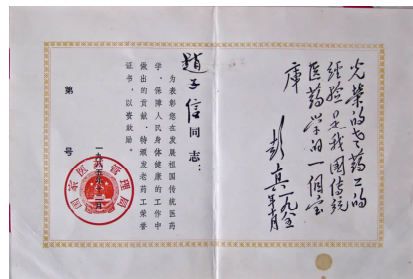


图9 赵子信老药工荣誉证书

药兼营中分离出来。昆明地区专门制售中成药的店铺开工于1826年^[7],这是昆明制药业的开端。到清末,昆明中药铺经营的主业是零售药材,兼制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制药业是副业,处于家庭手工作坊阶段。随着需求的扩大,部分作坊切药、制药等业务扩大,这就需要帮工,承担采购药材、切药、制药、柜台售药等工作,于是业务日益分化。投师文约制度不仅满足了药铺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且促进了药坊的分工,满足了竞争所需要的专业特长的培养和形成。师徒传授是现实的专门的手艺传习方法。经过师徒教育,一些徒弟设立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成药专营店逐渐增多。据民国《昆明市志》记载,1924年昆明药材业约120户中,专制丸散膏丹者约占2/10^[8]。制药业渐从中药商业中分离出来。

再次,药工队伍得以壮大。师徒制度培养了一批批制药工人。药工成为中药铺里区别于师傅、店主(零售商、中药商)等商人的工人阶层。如上所述,1938年前后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工会所属商店的年均使用人数为324人,即为药铺的职员和工友。尤其“四大金刚”开设的“百福堂”“大德药房”“杨大安堂祺昌药号”“协盛昌药号”等昆明药业大户,每个药铺的工人为14~15人,规模不小。“姚济药室在昆30多年,先后培养精通炮制中药、药物操作程序的中药技师四十余人”(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7:189.)。

在技术方面,炮炒煅炙等手工制药方法更加普遍和成熟。如1914年张星阶创立的“保和堂”是典型的家庭药铺,前店后坊,经营山货药材,兼营丸散膏丹。曾在该店当学徒的赵桂英女士回忆,“我们姑娘都会碾药”。那时使用的是铁碾槽碾药,“药放在里面,双脚站上去蹲轮子,人家说的脚踏风火轮”(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赵桂英访问记录,2013.)。一些技术诀窍得以提炼和总结。师傅教授的铡药顺口溜:“枳壳铡成乌鸦嘴,桔梗铡成云彩片,杭芍铡了飞上天”,老药工刘珍至今不忘(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刘珍访问记录,2013.)。对三七的加工,1938年从蒸煮发展到鸡油锅炸,除“生



图8 赵子信工作证内页

三七粉”外,能加工“熟三七粉”(政协昆明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1991:208-212.)。

专业分工和技术发展,积累了医药知识和技术储备,并为手工作坊向工厂生产准备了条件。1956 年昆明市中药行业公私合营,82 家中药铺和 19 家行商合并,成立“公私合营昆明市中药材加工厂”,直接管辖本企业的机关为“中国药材公司昆明市公司”,工厂仍为“工场手工业”。1957 年,工厂购进了第 1 部机器,是昆明中药现代工业的发轫。该厂《一九五七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报》称,“我厂自归中国药材公司昆明市公司领导后,迄今未变。本企业四月份国家投资咀片生产机 1 部后,生产有了显著的增加,机器生产约占全部咀片生产的 35% 左右。”(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56-1-1450.)从此,机器的工厂化生产比重逐渐增长。

4.3 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师承制度

近代昆明中医药业学徒,有组织地到药铺学习药材艺业,持续 30 余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师承制度。这些制度可分为投师文约、拜师仪式、上奉功德、奖惩以及保荐公证等事项。师徒教育制度涉及学徒、学徒的家庭、师傅、药铺和行帮或公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丰富。尤其入行、学艺和出师各环节严格谨慎,寓文于艺,制度设计精巧,给今日启发较大。

入行,慎择生徒。入学资格为品行端方,不染嗜好,年在 15 岁以上 20 岁以下者。药行尤重敦厚诚实者。药铺深知药品关乎人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之济,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自序),因此,近代昆明中药业收徒宁缺勿滥,精挑细选。选中的苗子,还需中人推荐,父兄作保,签订投师文约,举行拜师仪式。入行壁垒,虽缴钱微薄,但在学徒职业生生涯的起点,就把药业道德甚至全家生计纳入教学制度,对于提高药工水平和制药技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学艺,“药材艺业”。从传习内容看,近代昆明中药业学徒学习的内容为“药材艺业”,表述简洁,内容丰富:药材识别、检验、加工、制造、零售,甚至药店经营管理等都包含其中。具体到个人,徒弟所学内容不仅有商业道德、商业簿记、商业文件、贩卖术、商店组织管理、广告术、珠算、习字、商品、商业法规等通用知识,而且有所在中药铺的特色工艺技术等

专门技艺。师约束未详列,实际传习各展其长,因铺制宜,便于实施。

出师,效力 2 年。近代昆明中药业规定了“满师效力期”,可行性强。清末 6 年的师约束规定,学 3 年“满师之日再上功德银六钱方准外出帮工开铺”,于师于徒都无济于事。1924 年起,药行师约改为学 3 年再效力 2 年,仍在老师铺内。双方均能接受。一些行业,如棉絮业,规定毕业之日上功德银并备水酒谢师毕业(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32-12-61.),以示尊师。相比之下,效力 2 年比谢师宴更有利于技艺传授。

5. 小结

近代昆明药行师徒传习先于学校教育而起,发端于民间,由药材行业自发的有组织的推行,持续实施 30 余年,形成了师约制度。师约制度促进了药房手工业向现代工厂化发展,起到了振兴药商的作用。尤其在民国政府禁止中医药教育的情况下,昆明药行的师徒传习制度,医药一体,凝聚和展示了中医药从业人员坚定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人才、技术、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积累了教学经验,对后来的师徒传习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药行师徒传习是积极的,有显著成效的,是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有效形式,值得进一步挖掘,充实完善到当代的中医药师承之中。

志谢 承蒙昆明市档案馆提供档案,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集粹:下:工商篇[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55.
- [2] 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9 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 [3] 管鹏声.管氏医家十二代秘方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
- [4] 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 [5] 云南省卫生厅.云南卫生通志[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715.
- [6]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92.
- [7] 杨祝庆.昆明地区中成药开工年代查考[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4,35(2):83-85.
- [8] 云南省昆明市政公所总务课.昆明市志校注[M].字应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95.

(收稿日期:2015-05-05)

(本文编辑:张海鹏)